

继承和发扬“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

纪国祥 孟昭晋 卢中岳

1921年5月1日诞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是当时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斗争的新文化的生力军的一员。它的革命活动，在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年五月是“上海通信图书馆”诞生的四十周年，我们写了这篇文章以表示对它的衷心纪念。

(一)

“上海通信图书馆”成立的年代，是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时代。“五四”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觉悟和反帝斗争的日益高涨，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当时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份子走上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的道路，也促使了革命小资产阶级开始在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活跃斗争。广大进步青年，由于憎恨旧的社会制度和在思想文化方面深感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压抑，渴求新的精神食粮，热衷于新文化新思想的汲取，从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致力于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成立，就是在这一思想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一部分进步青年活跃斗争在人民大众的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之一——图书馆事业中的具体反映。

“上海通信图书馆”是由革命烈士应修人同志等团结了一些当时在上海钱业界做职员和学徒的进步青年，为了满足他们迫切的求知欲望而创办起来的，最初只是一个带着互助性质的青年人的读书组织，馆址设在天津路。尔后，随着加入读书组织的职业青年的逐渐增多，以及馆藏图书的不断扩充，才正式改变为对外开放的大众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前去借书，不收费，也不收保证金，并为本埠远道和外埠读者的方便而开展了通信借书的工作。这时在图书馆内部也成立了新的组织，定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借以推动图书馆工作的发展。

“上海通信图书馆”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艰苦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成长的过程。

在“五卅”运动前夕，随着文化统一战线的分裂，图书馆内部的成员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分化。这一政治上的分化就成了“上海通信图书馆”走向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在当时“共进会”的会员中，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都有一定的认识，但也存在着少数的国家主义份子。为了国家主义派的刊物“醒狮周报”是否应该在馆内陈列与借阅，这件事曾在馆内引起了尖锐的争执，结果是大多数人获得胜利。少数国家主义份子因此遂即登报宣布脱离。经过这一次的分裂，图书馆便从天津路迁到横滨桥克明路天寿里。天寿里时期可说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黄金时代。这时它在前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革命活动，内部团结一致，馆务蒸蒸日上：藏书增加到一千多种；经常向图书馆借书的有二、三千人，且是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华侨也写信来借书。

此后，“上海通信图书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革命斗争同呼吸、共命运，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骨干们都投身到这一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中，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五卅”运动时期，应修人等同志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馆内成立了团支部。“五卅”运动后不久（1925年7—8月间），“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几位骨干，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图书馆在他们的主持下，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应修人等同志还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办的“公理日报”，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派开火。在火热的斗争过程中，图书馆的规模又有了相当大的扩展：藏书增至三、四千种；流通出纳量大大增长；馆舍也感不够用，就与当时上海世界语学会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合租了一幢小洋房作为馆舍。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紧

張的政治斗争和工农群众运动上。“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骨干們也多投入到蓬勃展开的实际斗争中去，像应修人同志就于1926年底离开上海，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虽然如此，但是留馆的同志們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以表示对直接投入政治斗争的同志們的贊助与支持。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日子里，在图书馆的門前，国民党反动派也揮动了屠刀，“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不少同志遭到了牺牲。“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这时馆务就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但为时不久，“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党的领导下，在苏区革命运动的鼓舞下，补充了一批新的干部，又在血迹面前重兴起来，繼續斗争，把停顿一时的图书馆重又搞得热火朝天。到1928年，“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藏书剧增至五千多种，經常讀者发展到五百多名。

1927年后，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其反革命的軍事“圍剿”，展开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大肆摧殘革命文化，封閉进步的文化組織。就在1928年的5月4日，“上海通信图书馆”终于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封閉。

“上海通信图书馆”被封閉了，但它所撒下的革命文化火种却是扑灭不了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部分骨干后来又繼續创办了公道书店、西门书店、静安书店以及新书推荐社等，而且还出版了推荐新书的月刊。也有一些工作人員深入乡村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共进会”的會員們大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开展文化活动，坚持革命斗争。

(二)

“上海通信图书馆”从它1921年創設之初就是带着无产階級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現的。以上海之大，在当时还找不到一个完全公开的图书馆，仅有的寥寥无几的图书馆，不是“仅供独夫作裝飾品”，就是“志在保存国粹”，实际上都是为少数統治階級服务的藏书楼。而“上海通信图书馆”则首先取消鋪保，廢除押金，免費为广大平民知識分子服务，这在当时中国确是一个創举，与那些要鋪保，要押金，限制重重，門戶森严，带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階級图书馆比較起来，形成一个鮮明的对照。

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斗八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从办馆思想到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曾有过丰富的創造

和极大的改革。

“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者的信仰共产主义，傾向革命，一开初就有自己鮮明的战斗綱領和奋斗目标。在1921年的“創立宣言”中，他們提出了两大希望：（1）“成为远近人們的藏书庫”^①；（2）“成为大規模‘上海图书馆’底先导”^②。这正是他們怀抱共产主义理想来从事这一文化事业的体现。

他們所认为的“沒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有产者階級”^③，以及選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作为图书馆的創立日期，都說明他們是把图书馆看作向广大劳苦群众傳播新思想和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工具。无疑的，这种主張在当时是极有进步意义的，虽未明确提出为无产階級服务的口号，但实际上已經包含有为无产階級服务的思想因素。以后，随着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傳播和中国革命的深入，以及他們对馬列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者們对于革命的图书馆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逐漸明确起来，开始不滿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活动局限在城市小资产階級中間，感到有进一步为更广大的无产者服务的必要。应修人同志在1926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讀者自由”一文中就曾写道：“黄包车夫的額日流汗……，他們与图书馆簡直毫不发生一些关系，我們辛苦究竟为着誰来？”他更迫切地感到“非有革命的总解决，一切枝枝节节終是事倍功半；”^④但同时，他也肯定“‘上海通信图书馆’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咱們义不容辞的，并且这些工作也下是枝节的，也不是与革命絕不生关联的。”^⑤于是他們进一步把图书馆工作同当前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把图书馆和革命文化活动，看作是教育人民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的不可少的有力武器之一。

正是这种光輝的革命思想，鼓舞着“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者，他們頑强地从事于自己的日常工作。“上海通信图书馆”沒有专职的館員，日常館务全由“共进会”的干事会負責組織义务工作者来担任。为了完成大量的邮借工作，义务工作者們每每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再在館里繼續工作到深夜，这种

①②③ 見：“上海通信图书馆創立宣言”，載“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第六版，1926年10月。

④⑤ 見：应修人給元启的信，“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第62頁。

不辞辛苦地为讀者服务、为傳播革命思想服务的精神，确实令人欽佩，值得我們好好学习。

也是由于这种光輝思想的指导，“上海通信图书馆”大力地收集、流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十分注重藏书的思想性，以收集“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术文艺书报”^①为主旨，有原則地收集图书报刊，慎重地进行藏书建設，并且設有审查委员会，經常进行藏书成份的分析，决定入藏书刊的取舍。这个委员会是由具有高度政治思想和文艺修养的工作人员組成的，被认为是“对‘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作用有决定意义的机构。这样，它严谨地收集了几乎全部的新文化出版物，尤以革命文学和左翼新文化书刊为最丰富。它藏有‘共产党宣言’等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以及‘通俗資本論’、‘共产主义ABC’等傳播馬列主义的著作，有党领导的上海书店、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有‘向导’、‘新青年’、‘前鋒’、‘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而且还收集了党的秘密出版物。所有这些书刊，为工作的开展，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傳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吸引和教育了广大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充分地体现了革命图书馆的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原則性。

重視流通工作，重視讀者工作的质量，千方百計为讀者服务，更是“上海通信图书馆”最大的特点。“上海通信图书馆”創造性地使用了通信借书的方式，致力于“不让任何地方的人們讀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②，“以設身处地的用心为讀者着想，使不受路途限制，不受經濟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時間的限制”^③，切实有效地把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图书广泛流通到全国各地去。

在邮寄借书的工作中，“上海通信图书馆”尽力从便利讀者出发，把借約同寄书的封皮合印在一張紙上，在寄书同时就寄上還书封皮；他們細致地为讀者考虑，在书目中每本书都标有重量和借期，方便讀者計算邮期，也便于館务；他們甚至不怕麻煩，为讀者寄存邮費，逐次結算，每次扣銷并有清楚的帳目。

“上海通信图书馆”特別重視讀者服务工作的质量，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来反映报道館藏，指导讀者閱讀；而为了“使得借书者与館之間有条具体的息息相通的桥梁”^④，“不断挑动借书者的讀書兴味”^⑤，图书馆又定期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

館月报”，月报上經常刊登每月书目、会务报告，发表新书介紹、新书摘要、文化时評、讀書商討之类的文章。以上两种出版物对于推荐图书、指导閱讀、反映讀者意見、密切与讀者的联系，都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們的热心服务，得到了广大讀者的爱戴与支持。在館內的一間小小閱覽室里經常挤滿讀者。“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們更是信任讀者，依靠讀者，与讀者打成一片，发动讀者互相服务，从而增强了讀者們的主人翁感。正因为此，所以該图书馆前后出借图书数万次，損失的数字只不过千分之七、八，而且其中大多数还是在邮寄途上丢失的，即使邮寄丢失，但讀者們还自願地要求賠償損失。在館內，則經常有許多讀者自动来帮助工作。这在当时是任何一个資产階級图书馆所不能企及的。

“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們，怀抱着革命理想和崇高的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在业务工作中，他們敢于冲破当时我国資产階級图书馆的老一套，运用集体的智慧創造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例如他們曾經根据新的思想体系，編制了新的图书分类法，同时还做了拉丁化汉人著者的拼音著者号的尝试。

图书分类法是一种全面地系統地揭示图书馆藏书內容的工具，直接影响图书馆所推荐宣傳的图书，以及正确系統地引导讀者的自学。他們重視到这一点，因而就认真地研究了当时所能見到的各种中外文图书分类法，认为“有許多图书分类法是異常陈旧和悖謬的”^⑥。他們认为当时簡直沒有一本图书分类法能够适合于傳播新的思想体系。因此，他們說：“对于那个不适現狀的旧法（指原来采用的日本分类法——引者），我們怎肯姑息而不毅然改革呢？”^⑦于是他們就以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創造性地編制了一部“S.T.T.分类法”（S.T.T.即“上海通信图书馆”拉丁化新文字的縮写），这部分类法

① 見“上海通信图书馆共進会章程”，“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1期，12—13頁。

②③ 見“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讀者自由”，“应修人漢华选集”，59頁。

④⑤ 見应修人給元启的信，“应修人漢华选集”，62頁。

⑥ 見：“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2卷4号，扉頁。

⑦ 見：“我們的书类与书号”，“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2卷1号。

完全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以美国为主体的“杜威法”，以及以美国杜威法为蓝本的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等。从现在所能见到的S.T.T.分类法简表看来，这种类目安排和类表编制的方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部分分类法以中国为主体，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来设置类目。在“社会运动”下，首先列出了“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在政治类的“帝国主义”类目下，则充满了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本来面目的子目，如“殖民政策”、“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特权”……，并且还列出了“民族运动”类目；为了便于介绍宣传苏俄文学，把苏俄文学列在西方各国文学之前，诸如此类。总之，这部分分类法适合了馆中工作的需要，便利了新文化书刊在书目、月报中的揭示，尤其是帮助了读者系统地学习研究新文化和新思想。“

上海通信图书馆”八年的艰苦卓绝工作，大力收集流通进步的书刊，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传播“五四”以后的新思潮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群众中的影响，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有许多青年，得到“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帮助，阅读了革命书刊，政治思想上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提高了觉悟。作家汪静之回忆道：“五卅”运动那一年的秋天，应修人同志拿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我看，我才好像瞎子睁了眼一样，不像过去那样盲目糊涂了。我当时就写了“劳工歌”、“破坏”等诗篇，对敌人表示了强烈的憎恨”①。“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写个人的悲欢，准备学写革命诗”②。

更有许多青年，通过参加“上海通信图书馆”和“共进会”的活动，进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其中有许多人在今天已成了我国文化教育战线以及其他革命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当然“上海通信图书馆”和“共进会”成员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他们虽则倾向于革命，从事于革命，但对革命的认知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当时某些成员中还是比较朦胧的。我们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某些论述还有不尽精当的地方，甚至早期还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由于“上海通信图书

馆”身处大都会，它的活动也受到限制，未能完全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中去，而只局限于革命的或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虽然如此，但是它的光辉的革命工作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大队伍，重温先驱们这一光辉的斗争史，继承和发扬“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继承和发扬“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就是要学习他们自觉地把图书馆工作作为党的革命斗争的一部份，始终保持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学习他们热心忘我、千方百计地为广大读者服务的精神，依靠群众，在群众中生根，踏踏实实地帮助读者利用书刊，提高革命觉悟，获得先进文化知识；更应学习他们在反动统治下，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勇于创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我们今天的工作中，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文教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工农兵方向，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图书馆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这也就是我们对先进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最好的纪念了。

附言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楼适夷、许元启等几位“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老前辈的殷切关怀和大力帮助，向我们介绍情况，提供资料，给我们极大鼓舞。特在此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①② 见：“惠的风”，“自序”，1957年，人民文学。

